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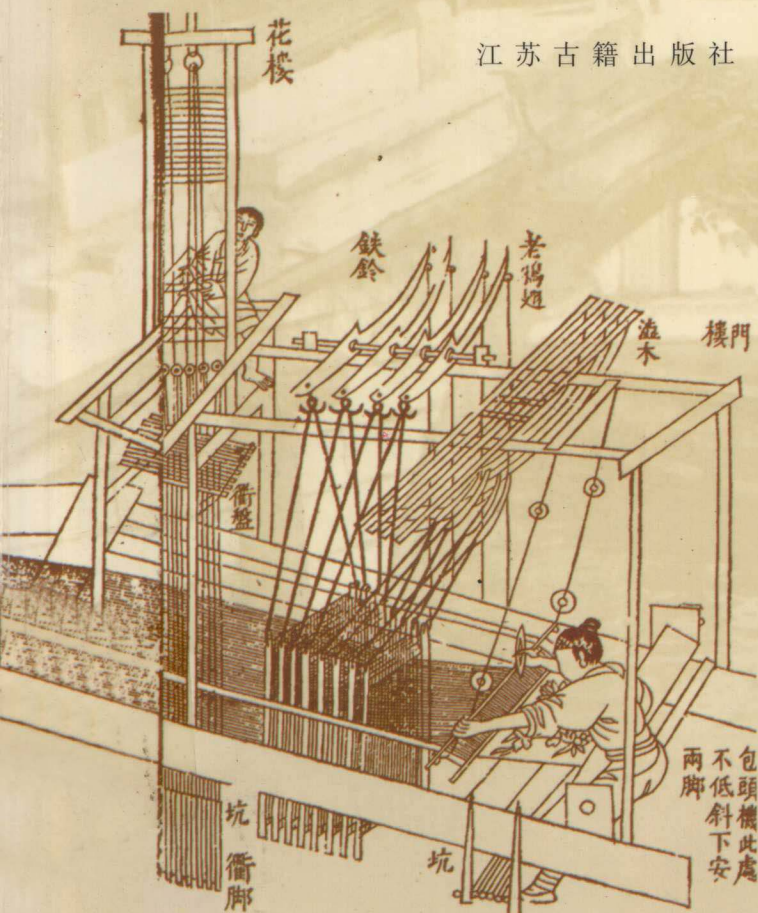
江南文化

张承宗 著

与

经济生活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



江南文化与 经济生活研究

张承宗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文化与经济生活研究/张承宗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643—253—1

I. 江… II. 张… III. 文化—研究—江南(古地名)—文集 IV. G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5794 号

江南文化与经济生活研究

著 者 张承宗

责任编辑 王建平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印刷制版厂

印 刷 者 无锡春远印刷厂 邮编 214027

开 本 大 32

印 张 20.25

字 数 505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253—1/G·26

定 价 50.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我对江南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江南文化与经济生活研究》代序

一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历史老师讲课总是按照古代——近代——现代的顺序进行。自己当了老师，也是这样讲给学生听，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其实，历史科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人们为了现实的需要，才去寻本溯源，由近及远，探索历史真谛，以为人生与社会的借鉴，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正常思维模式。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江南文化与经济生活研究》，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结合江南地方特点，对近代与六朝这两大历史时段不断反思与探索的结果。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本书所收 38 篇文章中，有 5 篇是与他人合作的。合作者中有年长于我的师长，有一起共事的青年教师，也有我的学生。按照编纂个人论文集的惯例，合撰与联名发表的文章是不应该收录的。但是，本书是在给江南地方史研究生讲课的过程中选编的，为了让学生知道，一个人在走进学术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老师的指导，而且要学会与他人合作，我还是把这些合作的文章收录入集了。对于合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在文章后面要如实

介绍，以反映他们的劳绩，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二

本书既然是应研究生教学需要而编，那就应该考虑教学的实际。所以，我想在转变学习方式与思维模式上作点尝试。本书不采取按作品时代为序的方法，而是按研究的视角，编为七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是对人文环境、政权兴亡、学术流变、社会思潮与文化成就的综合研究，收文章五篇。

前三篇是关于东吴的：《吴地人士与东吴兴亡》考察东吴政权的全过程，特色在蠡清六朝吴地地理范围，为全文立论奠定坚实基础。《三国“吴四姓”研究》从家族史的角度，透视与东吴息息相关而各有特点的张、朱、陆、顾四大姓，其主要学术创见在辨析“吴四姓”、“吴郡四姓”、“吴旧姓”内涵之异同，指出“吴四姓”中的“吴”字，应该是指“东吴”，并非仅指“吴郡”，从而廓清了四姓研究中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疑点。《东吴学术散论》考察“经学与玄学”、“史学与文学”，不是按学科分为四段，而是两两组合，那是充分考虑东吴学者“以玄释经”的风气与文史兼治的特点。文中史学部分由金召洋同志起草，根据韦昭《洞纪》，揭示东吴曾用“建安二十七年”纪年，现已被 90 年代考古新发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证实。

在六朝的六个朝代中，东吴只是一个“点”。东晋与南朝宋、齐、梁、陈的文化，向上追溯，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江南的东吴，还有一个来源是以中原为中心的魏晋。江南文化有自身的特点，又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不可忽视。《魏晋南朝的清谈与经学的玄化》，就是为了沟通这条“线”的。《东晋南朝长江文化的主要成就》，则是用“面”的写法，分门别类地从七

个方面对这段时期的江南文化作了一个全景式的描绘。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入研究，逐步扩大，不断推进，这是研究生学习阶段必须掌握的研究方法。

第二个系列是对清代、近代及现代学术文化人物的个案研究，收文章十一篇。

人物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创立纪传体，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的创举。从此，“二十四史”代代相传，成为人类文化之瑰宝。所以，研究江南文化也必须以人为本位，从人人手，逐个研究。这对于初学者较易入门。

1978年，当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史学史专业学习时，尹达师给我指定的研究方向是近代史学，并让我去上海跟吴泽师学习。1979年春，吴泽师为我选的第一个题目就是《龚自珍史学研究》。这就是我研究江南近代学术文化人物的开始。我在龚自珍研究中的主要创见有两点：一是运用诗文证史的方法，从龚诗《常州高才篇，送丁若士》考证出龚氏在16岁作《尊隐》一文时就和常州今文学派有所接触，而不是在28岁“就刘逢禄受公羊学”才开始。这对弄清龚自珍改革思想之渊源很有价值。二是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论述了龚氏在方志学、谱牒学、人物传记以及训诂、校讎、考据之学与古器物研究上的成就，为同行学者研究清代实证史学的演变提供了启示。

研究生写文章要扎扎实实，切忌空泛，在学会个案研究后，要开展群体研究、比较研究与系列研究。如《“扬州学派”简论》就属于群体研究。从标题看，扬州似与江南无关，其实不然。因为扬州学派是在吸收吴派、皖派、浙派长处后，才自成一派的。扬州与江南，在学术文化上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如龚自珍、

魏源、俞正燮是同时代人，以经济观点而论，龚自珍虽然写了脍炙人口的《平均篇》、《农宗》等文章，但龚氏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农业生产领域，其基本思想并没有摆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的束缚，意识形态仍属于封闭的自然经济范畴。俞氏却把视野注意到了商业流通领域，注意到了经济作物的栽培，注意到开矿及中外货币问题。比俞、龚稍后一些的魏源，注意研究漕运、盐政、货币，鸦片战争后进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视野更为开阔，这是时代所造成的。若以三人之卒年而论，俞氏卒于1840年，龚氏卒于1841年，魏源卒于1857年。俞氏之卒早于龚、魏，而其经济见解高于龚氏、而略逊于魏源，这就是比较研究。再如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及《存稿》，是蔡元培得益最多的书之一，建国后很少有人研究。我连续写了《俞正燮的治学方法与边疆史地研究》、《俞正燮男女平等思想述评》、《俞正燮史论史考中的政治经济见解》等三篇文章，就是系列研究。

近代历史人物研究中，有冷有热。热门人物，研究者多；冷门人物，罕有论及。要打破这种热点过热、冷门过冷的局面，必须开拓新思路，这是研究生选题以前，必须认真加以思索的。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听谢国桢先生讲明清版本目录学，如数家珍，因而对图书版本目录之学产生浓厚兴趣。1979年读《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受到启发，开始研究叶德辉，在上海、长沙、苏州等地广搜材料，访书过程中，得识湖南学者韩长耕、杜迈之诸前贤，受惠良多，后来又反复研究，持之以恒，终有所成。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缪荃孙史学研究》。缪荃孙是我国近代图书目录事业的先驱，他主持创办南京、北京两大图书馆，泽惠后学，成就卓著，但建国后研究者甚少。为了写好这篇论文，我在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搜访材料，费功甚巨，论文答辩由上海图书馆馆长顾

廷龙先生主持，顺利通过。后来，论文以《缪荃孙的史学成就》为题发表。198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唐才常的史论，以往也很少有人注意。1980年我在长沙湖南省博物馆查阅《湘学报》，发现不少材料。次年执教于苏州，购得《唐才常集》，又从校图书馆找到《觉颠冥斋内言》、《浏阳二杰遗文》，资料已齐全。因当时工作忙，该文写完第一段，列出二、三两段提纲后，即将全部资料交陈映芳同志，请她协助起草，终于完成。

柴德赓先生是史学太师陈垣的学术传人，我对柴先生的道德、学问、文章一直十分敬仰。60年代前期，他在历史要籍介绍、《资治通鉴》研究、清代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国内有广泛影响。为了纪念柴先生，我与何荣昌先生曾受系领导委托，共同主编《青峰学记》。《柴德赓与他的老师陈垣》是从师生情谊阐发陈垣爱国思想对柴德赓的影响。

这个系列中属于科技人物的仅一篇，介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的贡献。这是薄弱环节。

第三个系列是学术文化著作研究，收文章六篇。

前两篇是对传统史学的评论与研究。《汉晋春秋》是编年体，作者习凿齿是襄阳人。襄阳在汉水南岸，北岸为樊城，合称襄樊。六朝时期，襄阳地位极其重要。刘表治理荆州，治所在襄阳。《后汉书·刘表传》所云“江南悉平”，是包括襄阳在内的。魏蜀交战，关羽水淹七军，战争发生在襄樊一线。十六国时，后赵、前秦与东晋的战争亦多次发生在这一线上。梁武帝萧衍原为南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并由襄阳起兵，夺取政权而称帝。所以，六朝时期，襄阳主要属于南方政权管辖，被视为江南的地域范围。习凿齿的“正统论”对我国古代“国史结构”及“国史正史化”观念意识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文献通考》是典志体，《经

籍考》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马端临是江西乐平人。他生于宋末元初，继承了习氏的“正统论”，并在“正统论”的旗帜下高扬民族思想与爱国主义。

《碑传集（附续、补、三编）》合起来有 356 卷，属传记类史书。钱仪吉开了清代中叶研究当代史的风气，为缪荃孙、闵尔昌及汪兆镛所继承，四书前后相续，内容丰富，对研究清代及近代历史极有价值。但因卷帙浩繁，爬梳困难之极，罕有人作系统研究。当时，承蒙历史系资料室允诺在暑假期间将线装书出借给我，才得以在盛夏酷暑下日日翻检，完成评介任务，撰写成文。

后三篇是对鸦片战争后学术风气转变的考察。《〈康輶纪行〉与姚莹的治学特点》撰于 80 年代。姚莹是安徽桐城人，是鸦片战争时期实地考察我国西南边疆史地的第一人。本文主旨在提倡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开拓新领域，开创新风气，以反映时代的脉搏。《鸦片战争史的通俗演义——〈罌粟花〉》，写于研究生学习期间，当时吴泽师正为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写重版前言，让我协助搜集有关演义体史书的资料，并写成专题。此文蒙吴老推荐，在《中学历史》发表。后来，吴老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又让我把《罌粟花》写成辞条，收入辞典。《罌粟花》的作者元和观我斋主人是苏州人。《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是我参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编写“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一节时的副产品。不同之处在：写书是将同一时代相关史著放在一起，用对比综合的笔法，文章则是用个案研究的体例。王韬是走出吴中，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他在史书写作上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

第四个系列是宗教文化研究，收文章两篇。

前一篇是从宏观方面论述宗教对六朝长江文化的影响。后一篇是对《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宗教人物杂传的逐一考察。写

作过程中，利用了清代学者姚振宗、章宗源对《隋志》的考证成果。

第五个系列是区域经济文化与战略地位研究，收文章五篇。

前四篇《东吴时期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开发》、《蜀汉政权与长江上游文化区域的扩大》、《西晋时期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侨州郡县与长江流域的加快开发》，是对公元3—6世纪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开发所作的纵向考察。这些文章都是在90年代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长江流域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写的，较有时代气息。四篇之中，以论西晋的那篇为佳。此文用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互证的方法，填补了长江流域经济史研究中的一段空缺。第五篇是对六朝江州战略地位的考察，试图从中寻找一个特定地区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地位变化的内在原因与综合因素，以便为地区发展战略提供借鉴。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我来说还是一种尝试。法国年鉴学派史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对腓力蒲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的研究，在国际史学界早就享有盛誉。史学工作者治史要注意学习国外的史学方法，但不能照搬照抄，要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写出自己的民族风格。

第六个系列是经济文化生活与社会风俗研究，收文章五篇。

我对六朝南方风俗的研究始于编写《六朝史》之时，这个系列中有关饮食与服饰、婚姻与家庭及围棋活动的三篇文章都是从该书中节选的，只是在围棋活动中增补了新的考古资料。其余两篇文章是与孙立同志合作的，一篇论述蚕桑、丝绸、棉布生产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他出力尤多。还有一篇《〈荆楚岁时记〉与六朝南方风俗研究》，是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由我指导。该文为双视角，一是从史学史的角度评书，一是从民俗史的角度讲风俗。我赞成学生作多视角透析的尝试，修改后送《历史文献研究》发表。

第七个系列是史料与文献研究，收文章四篇。

史料与文献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清代乾嘉学派用考据方法整理资料，研究学术，为一个世纪以后人们用思想来探索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素材，功不可没。1984年5月，刘乃和先生来苏州讲学，我与几位青年教师随堂听课记录，并整理成文，由刘先生审定，刊于《中学历史》。次年秋，由刘先生介绍，在南京年会上参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从此不断得到刘先生的关怀和指点，对陈垣之学亦有进一步了解。本系列所收《王鸣盛对南北朝史的校勘》写于1989年，是向文献研究会嘉定年会提交的论文，文章运用陈垣讲的校勘四法，分析王鸣盛的校勘成果，后被文献会选编入《嘉定文化研究》。

《王国维与〈魏石经考〉》是1987年6月我向“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主旨在分析王国维的考史方法“二重证据法”，此文经华东师大袁英光先生修改定稿，以“司马平”笔名与我联名刊出。

《叶德辉赠曹赓笙〈观古堂藏书目〉题跋》，其价值在提供了一份稀见史料，弄清了叶氏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的各种复杂人际关系，拙稿中所言《复庵文集续稿》线装书，是向苏州大学图书馆夏淡人先生请教后才看到的。叶氏墨迹尚有《石墨镌华跋》，现藏于青岛图书馆。此跋涉及吴县洞庭王氏后裔事，可供治苏州地方史者参考。还有《叶德辉印〈通历〉一书简介》是我读刘节《中国史学史稿》时写的，该文是80年代较早介绍《通历》版本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先生在《唐代史学论稿》中有《说〈通历〉》一文，曾言及拙稿。

三

回顾二十年来，我研究江南文化所走过的路，大体可分为四

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1），在吴泽师具体指导下研治近代史学，结合江南地方特点，开展个案研究。

第二阶段（1981—1985），执教于苏州大学历史系，担任中国古代史教学任务，并继续从事近代史学的研究。由于教学与科研在时间安排上有矛盾，我就开始考虑寻找新的研究方向。1983年7月1日，尹达师不幸逝世。我参加尹达师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的编写任务完成后，就考虑把科研重点转移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来。该年9月，我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第九期上的《北魏立三长行均田时间研究综述》就透露了这个信息。1984年秋，我到四川成都出席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会上聆听了田余庆先生的总结发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给了我很大启发，明确了两点认识：一是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现在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陈寅恪四十年前提出的不少问题，没有大的进展，我们的研究应该在陈寅恪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二是南方各省区工作的同志应该结合地方特点进行探索。他说：“如果南方各省都作类似的探索，若干年后，探索有成，也许我们对六朝时期南方腹地开发进程能得到更多的了解。这不但可以大大地开阔我们对南朝历史研究的视野，而且还可以把陈寅恪所作‘江东世局之大变’的推论加以证实。”1985年秋，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成立，在学会的推动下，我适应形势，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走上了结合六朝，研究江南文化之路。

第三阶段（1986—1992），系领导让我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并要求我精心组织集体科研项目，以促进日常教学与学术水平的提高。在此期间，我在教研室全体同志的支持下，承担并主持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则项目《六朝史》的编

写工作，与田泽滨、何荣昌共同主编，并得到我系余行迈教授与铁道师院黄佩瑾教授的大力支持。此书由唐长孺先生题签，吴泽师撰序，卞孝萱先生写结语。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出版，1992 年春与读者见面。1992 年 6 月 10 日，《六朝史》鉴定会在苏州大学举行，与会专家一致给予好评。该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通讯》第八期刊登了书评，称该书“是一部独创性的断代史著作”。1994 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此外我还写了一些与六朝江南文化有关的散篇论文。

第四阶段（1992—1998），1992 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先生与《浙江学刊》编辑徐吉军同志联袂组织《长江文化史》的编写，邀我参加并承担第四章“南北对峙与文化交融”。我立即投入了这项新的科研工作。1993 年是顾颉刚先生诞辰 100 周年，5 月，李学勤先生与徐吉军同志来苏州出席会议。我已完成前三节，向两位主编交稿，并交换意见。1993 年底，全部完成任务。1995 年 12 月，《长江文化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次年，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这项科研工作，对我的江南文化研究，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最近两年，我又参加《黄河文化史》的编写，对南北两大区域文化的对比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四

在世纪之交，怎样把江南文化研究继续向前推进，我想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一）江南文化在全国的区域文化研究中应当如何定位？

无论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还是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我国南方与北方的实际分野应该是以秦岭—淮河划线。南方气候温和、湿润多雨，种稻养鱼，水道纵横，出行多用船。北方气候

寒冷，干燥少雨，区种粟麦，饲养马、牛、羊，出行用车、马。中国古代，在元朝大统一以前，中原王朝的版图基本上是在青藏高原以东，蒙古草原以南这块土地上，其中部横亘着秦岭和淮河，把这块大地一分为二。在北方基本上是黄河流域，在南方主要是长江流域。岭南的珠江流域，则被视为文化落后的边远之地，贬谪之所。明清至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珠江流域才成为得风气之先的地区。从军事上看，长江号称天堑，但实际上要是守不住淮河，那就很难保得住江南。历史上西晋灭吴、隋灭陈、元灭南宋、清灭南明，直至淮海战役解放江南莫不如此。

从区域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江南文化应该是长江文化的一部分，而长江文化则又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江南文化，而应该把它放在长江文化这种大区域文化的框架中去研究。从文化区域的划分来看，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滇文化、黔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以及处于中下游之间而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赣文化，都应该是长江文化的亚文化区。上述这些亚文化区的地域范围中，又几乎都有地处江南的部分。所以，江南文化的概念实际上应该是很宽的。

自六朝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南移，江南经济文化持续发展而愈显重要。这种渐重的过程是通过三次变乱跳跃式地完成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这三次变乱，分别代表了六朝、中唐至五代、南宋这三个对长江文化发展举足轻重的时期。永嘉之乱中人们为逃避战乱而纷纷南迁，这不仅充实了江南人口，还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不久建立的东晋政权及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江南，促进了江南的第一次繁荣，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南移之始。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在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间起到了抑彼扬此的效果，八年的战乱给北方经济文化以毁灭性的打击，却给南方的崛起与繁荣提

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包括北人南迁，农业商业繁荣，区域文化中心不断涌现在内的诸多因素使江南文化已开始逐步取代正在衰退中的中原文化了。到五代十国时，中国文化已是南重北轻。公元1126年靖康之难后建立起来的南宋，以临安（杭州）为都城。以后元、明、清各代，虽然都城仍大多在北方，但国家的经济、文化命脉更依赖长江流域来负担。如明代江南境内苏、松、常、嘉、湖五府交纳给国家的税粮之和，已占全国总额的五分之一，而苏州一府竟占了将近十分之一。作为区域概念“江南”的涵义也随着历史的推移而逐步缩小。明清以来，江南的地域范围才专指八府一州之地，即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九市。

我们研究江南文化，可以把今天的江南作为重点，但又必须考察其全过程，不能用今天的地理概念去涵盖过去的一切。区域文化研究要胸有全局，才能视野开阔。所以，一定要把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为区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科技文化研究在整个江南文化研究中应放在什么位置？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的今天，身处江南的史学与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对江南科技文化加以探讨，并告诉我们的学生。

当今考古发现的全新阐释，生动地再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历程。古代江南文明就科技水平而言，并不亚于黄河流域，如河姆渡文化中反映的水稻栽培技术、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和玉串饰、江西新干商墓出土的青铜四羊罍、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豕尊、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面像等许多考古发现都反映了史前至商周时期江南的科技文化与艺术文化水平。春秋时代吴国修筑的邗沟，沟通了江淮水系。秦代开凿灵

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在古代水利工程史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促进了交通运输与农田灌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漆器，浙江绍兴出土的汉代禽兽画像镜和神人车马画像镜，工艺水平都很高。酿酒技术、造船技术、造纸技术在江南也有长足进步，改进造纸术的蔡伦就是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人。

六朝江南的科学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青瓷器制造与铜镜制造极为发达。南京东吴墓中出土的青瓷虎子、青瓷羊尊，南京西晋墓中出土的青瓷狮形水注都很精美。浙江绍兴出土的西晋越窑青瓷谷仓罐、江西吉安南齐墓出土的茶托子，都是珍贵的出土文物。吴地精美的铜镜大量传到日本，而且还有吴地工匠在日本制造的铜镜大量被发现。天文学与数学的成就尤其突出，如东晋虞喜观察天文现象，发现了“岁差”。南朝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了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他制定的《大明历》规定一年为 365.24281418 日，与近代科学测量的天数相差不到 50 秒。六朝江南还出了许多名医，葛洪对狂犬病防治的研究，陶弘景对药物学的研究，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隋代大运河的开通，大大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隋炀帝巡游江都，所乘龙舟高四层达 45 尺，宽 50 尺，长 200 尺。隋唐时期，四川大邑县所产白瓷，质量上乘，越窑的青瓷为人们所看重。长沙窑制造的犀牛象座枕和绿彩鹿纹瓷壶光彩夺目。唐代的雕版印刷，最早出现于剑南西川的益州。

宋代钱塘人沈括，被李约瑟称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他对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对人类这一伟大发明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宋元时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是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另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杨辉是钱塘人。苏颂是福建同安人，他创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第一座天文授时钟。宋元时期的瓷器制造极为发达，江南景德窑、越窑、龙泉窑

和建窑更是名闻遐迩。尤其是棉花生产与纺织先进技术，由黄道婆从崖州带回松江乌泥泾，从此“乌泥泾被”名闻天下，江南的棉织业举足轻重。劳动人民在圩田建设、治河技术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保证了江南农业的高产与丰收。

明代的三大科技名著《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作者李时珍是湖广蕲州人，徐光启是上海人，宋应星是江西奉新人。《徐霞客游记》的作者徐霞客是江苏江阴人。苏州的能工巧匠蒯祥有“蒯鲁班”之称，参加了故宫三大殿的重建和长陵、景陵和献陵的建造。清朝的天文历法学家王锡阐是江苏吴江人，他开始参用西法，改进历法的计算方法，达到了十分精确的程度。还有一位天文历算学家梅文鼎是安徽宣城人。他写的《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他的数学巨著《中西数学通》，几乎总结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全部知识。

近代中国科学家中，江南人物更多，如复旦大学沈渭滨主编《近代中国科学家》一书，选择了数学、化学、物理、植物、医学、天文、地理、地质、造船、铁道、飞机设计、兵器制造和水利建设等十三个方面二十余位科学家，分别立传，其中江南人物就有十几位之多。近代以来，江南的经济文化始终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与这个地区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是分不开的。

总之，科学技术在江南文化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总结江南的科技文化成就应该是江南文化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1999年3月22日于苏州大学